

中国 现代文学 传统

南京大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 ■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3

南京大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 ■ 编

中国 现代文学 传统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65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传统/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编.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2

ISBN 7-02-003929-4

I. 中… II. 南… III. 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3261 号

责任编辑:李建军 责任校对:刘光然
装帧设计:柳泉 责任印制:周小滨

中国现代文学传统

Zhong Guo Xian Dai Wen Xue Chuan Tong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市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20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875 插页 2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02-003929-4/B·244

定价 19.90 元

目 录

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道法体系”	朱寿桐(1)
思想史取替文学史?	
——关于现代文学传统的二三随想	温儒敏(15)
中国现代文学民族化与世界化相互变奏的	
制导性传统	朱德发(23)
略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政治化传统	
——从三十年代文学谈起	朱晓进(35)
论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再认识中的“现代性”	
问题	李 怡(46)
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问题的初步思考	朱文华(59)
中国现代文学复性历史论	喻大翔(66)
现代化大叙事与中国新文学传统	黄曼君(77)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传统创作思维模式	(日本)岩佐昌暉(88)
论中国现代启蒙文学思潮的内在思想资源	张光芒(100)
中国现代文学“启蒙”传统与古代“教化”文学	何锡章(111)
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传统与宗教论纲	许祖华(121)
宗教意识的链接与文学的选择	
——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一种解读	袁国兴(133)

作为载体的人文期刊与现代文学传统	刘增人(145)
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的现代主义理论话语	赵凌河(155)
科学主义与中国文学的写实主义	俞兆平(166)
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度西潮	马 森(178)
略论中国现代纯艺术思潮与传统文化	胡有清(188)
审美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	周仁政(200)

世界文学格局中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断代

模式	王 宁(211)
----------	----------

文学知识、文学组织和审美信念

——晚清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	王本朝(230)
-----------------------	----------

对《新青年》发动批孔及文学革命的

再认识	陈方竞 刘中树(240)
-----------	--------------

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研究的价值立场

丁 帆(249)

由台湾看中国现代文学传统

龚鹏程(263)

“乙未割台”与文学革命

龚显宗(276)

战后台湾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

——以陈映真为个案	(韩国)金良守(290)
-----------------	--------------

割不断的渊脉

——从香港现代文学本地研究中窥析其

传统	张慧敏(303)
----------	----------

论上海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

杨剑龙(314)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上海书写

刘 俊(323)

齐鲁文化与山东现代文学的新传统

魏建 贾振勇(335)

再谈“五四”传统与戏剧的现代化

——兼答批评者	董 健(345)
---------------	----------

二十世纪中国新诗传统的建立	黄维梁(361)
论现代新诗的艺术系统	周晓风 余玲(370)
论“新民歌运动”的现代来源	
——关于新诗发展的一个症结性难题	张桃洲(381)
现代主义诗歌:中国对西方的精神接受	罗振亚(392)
中国自传:现代性的发生	杨正润(403)
沈从文:中国现代小说的新传统	(新加坡)王润华(417)
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天使型女性	李 玲(429)

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道法体系”

□ 朱寿桐

中国现代文学演进的历史虽然比较短暂,但它确已形成了以“五四”新文学为核心的传统力量。这股传统力量既有力地支撑着中国现代文学以鲜明的新质独立于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势力之外,又吸附着许多真正属于现代中华民族的价值因素和时代理性,使得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化和现代化的历史走向中不致迷失自身。从“五四”研究进入现代历史和现代文学史学术领域的学者一般都倾向于承认这样的传统,王瑶即主张捍卫“五四”新文学传统,指责40年代有人“以所谓‘民间形式中心源泉’论来否定‘五四’文学传统”。^①作为尝试,我从中国古老的传统学研究中常常出现的“道统”、“法统”、“体统”、“系统”等概念中获得启发,并挪借这些词语分别指称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几个方面,进而从“道法体系”上把握和表述中国现代文学传统。

五四文学革命中否定的“文以载道”,其要害显然是在一个“道”字。传统文人(特别是宋儒以降)强调文学须阐释圣经贤

^① 《在东西古今的碰撞中·序》,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

传,维护封建道统,遂有“文以载道”的定则。新文学家们正是针对这种“道”的内涵,向“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念频频发难。其实摒除了“道”的陈腐内容之后,他们并不否认文学作为思想观念“载”体的功能和价值。新文化运动的护法者蔡元培便一直认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① 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如周无等即指出,陈腐的传统文学的要害乃是在于“无思想”。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申斥旧文学走向末路的种种行状,第一条便是“言之无物”,明确主张文学改良的第一义就是要能够表现“思想”和“情感”。文学革命家一面反对旧文学的“文以载道”,一面强调新文学的思想和情感表现功能,明白无误地披露了他们在这方面的观念指向,即要害不是在“载道”,而是在“载”旧道还是新道。新文学所“载”的新道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道”传统,借用古人现成的说法,这便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道统”。

中国现代文学的“道统”,其实便是指在传统形成过程中,新文学一贯强调表现的以区别于旧文学价值内涵的思想、情感内容。对于这种内容的概括后人已没有多少置喙的余地,因为文学革命的倡导者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道统”的建立者们对此已经作过清晰的表述,只不过他们并没有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意义上加以论证而已。倡导文学要表现“思想”、“情感”的胡适承认,周作人“人的文学”概念乃是新文学新的思想内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道统”)的最好概括:“这是一篇最平实伟大的宣言。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他叫做‘人的文学’。”^② 傅

① 蔡元培:《总序》,《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② 胡适:《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斯年更加明确地指出，“人的文学”正是新文学所应表现的新的思想的内涵：“我们现在为文学革命的缘故，最要注意的是思想的改变。至于这文学革命里头应当有的思想是什么思想，《人的文学》中早已说得正确而又透彻……”^①

如果说“人的文学”的“宣言”还并不能在当时引起很普遍的认同，那么，周作人在阐述“人的文学”精神内涵时对文学中“人”的因素的强调，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观念传统以及对于旧文学的根本性区别，则为大多数文学革命家和新文学创締者所承认并加以不无自豪的称赏。鲁迅这一句话几十年来被论者反复征引，已经在一定范围内成了耳熟能详的定论：“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②它以简洁明了的概括性和相当的力度点示了新文学最初建立的思想观念道统。五四新文学建设的主要设计者之一的沈雁冰与鲁迅的观点完全一致，不过他点出了“个人主义”的命题：“人的发现，即发展个性，即个人主义，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主要目标。”^③虽然他本人积极倡导并参与其事的文学研究会的创作并不普遍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的意味，但其“为人生的文学”的标榜与“人的文学”不仅在概念上有很程度的重合，而且，考虑到提出“为人生的文学”口号的文学研究会成立宣言与提出“人的文学”概念的那篇文章都出自同一人之手，就不难确认这两者之间不言而喻的内在的精神联系。难得的是，新文学阵营恰好正是在“人的文学”和“人的发现”这样的命意上取得了基本一致，对“为人生的文学”颇有保留的创造社作家郁达夫后来也坦荡地承认，“五四

① 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② 《且介亭杂文〈草鞋脚〉小引》。

③ 茅盾：《关于“创作”》，《北斗》1931年9月创刊号。

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个要算‘个人’的发见。”^① 几股新文学力量的一致,无可訾议地说明了,中国现代文学表现的“原道”便是“人”或者“个人”,是包含着个性主义内涵的人文主义。

周作人在解释“人的文学”概念时显然兼顾到了通常所说的“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这两重意思:“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但他更愿意将“人道主义”在“个性”强调或“个人”关怀意义上加以展开,从而得出表述上多少有些别扭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命题。胡适之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从反面说明了个人价值之于社会的意义:“等到个人的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无论是周作人还是胡适,都没有偏执地强调个人或个性主义,都充分顾及到个人因素或个性价值的社会体现,这便是胡适所谓的“健全的个人主义”。

陈独秀、鲁迅等没有直接沿用“健全的个人主义”这一概念,但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观念基础的他们的新文化观和新文学观都注重个人主义或个性主义的倡扬,同时更注重在社会改良意义上审视个人主义或个性主义,这两个方面的兼顾及其间相对侧重点的凸显恰好构成了“健全的个人主义”概念表述的全部内容,它代表着“人的发现”,个性的倡导的基本价值形态,是五四新文学的基本之“道”,也即中国现代文学“道统”的价值显示。这样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作为新文学的“道统”在五四时代得到了较为普遍的文学呈现。新潮社、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文学,向来被人们理解成侧重于“人道主义”呼唤和社会道义担当的写实之作,殊不知他们的人道主义总是以“人”的价值和个性的尊

^① 郁达夫:《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重等个性主义或个人主义观念为基准,为前提,无论是“这也是一个人”(典型地体现在叶绍钧的小说《一生》中)的反诘还是“人生究竟为什么”(普遍地存在于文学研究会的问题文学中)的疑问,都不可置疑地强调了人及其个性因素的先决性,从而拉开了与悲天悯人的传统文学之间的距离。周作人在倡导“平民文学”时声言“平民文学决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正是要凸现其中的人的因素和个性含量,与所谓“健全的个人主义”内涵相通。

在人的发现意义上强调人格独立和个性发展,这种被称为“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现代文学道统内核显然包含着对于压抑个性、妨碍人格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秩序的反抗要求。五四新文学有关“人”及“健全的个人主义”的道统表述始终洋溢着这种反抗的激情,对这其中的关系胡适有着极为清晰的认知,他说:五四“造成一个可以称为‘个人解放’的时代。然而当我们提倡那种思想的时候,人类正从一个‘非人的’血战里逃出来,世界正在起一种激烈的变化。在这个激烈的变化里,许多制度与思想又都得经过一种‘重新估价’。”^①胡适的表述与他撰写《文学改良刍议》时一样语气温和,但温和中所透溢出的反抗意识仍与那篇著名檄文所体现出来的一样明显。个性的肯定既然须以个人的“解放”为前提,则“人的文学”和“健全的个人主义”必然包含着对于旧传统秩序的颠覆要求,由此显现出来的“重新估价一切”的时代意气必然意味着一种新传统的确立。这是一种体现“健全的个人主义”等新文学“道统”内核的运作方法的一脉传统,仍假古代词语表述,则是相对于新文学“道统”的“法统”。中国现代文学“道统”体现于方法论和风格论意义上的“法统”乃是普遍

^① 胡适:《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的反抗。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在风格论意义上承传的“法统”体现着“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而在社会革命和文化改良的急遽浪潮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则以崭新的反叛姿态开启了文学运作的新法统。早在新文学产生之前,鲁迅就呼唤着“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文学精神,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等文章针对旧文学传统种种弊端提出否定性的“八不主义”,陈独秀大书《文学革命论》,在所谓“三大主义”的旗帜下提出将陈陈相因的传统文学秩序悉数“推倒”,都为此一新法统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作为文学“革命”的成果,整个新文学的“立意”理所当然地落实在普遍反抗上。文学革命运作的目标当然是对旧文学的反抗,文学革命时期的重要干将傅斯年指出,“文学革新”的首要意旨便是“对于过去文学之信仰心,加以破坏”。^①新文学理论建设充满着对于旧文学传统的破坏欲望,新文学创作也渗透着反抗的情绪,《狂人日记》、《沉自己的船》等作品固然洋溢着鲜明的反抗激情,《终身大事》、《是爱情还是苦痛》、《这也是一个人》等何尝不传达着个人主义和人本主义的反抗声讯?文学研究会以“血和泪”的控诉反抗着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创造社更以自我表现文学宣泄着内心反抗的郁积。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文学传统形成期,先驱者们都不约而同地将信任的目光投向挪威作家易卜生,并有郑重其事的“易卜生主义”之倡;而在鲁迅、胡适等先驱者看来,易卜生文学的基本价值便是宣扬无往不在的深刻的反抗,不仅反抗社会体制,而且“独战多数”,连“群众”也成了反抗的对象。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

^① 《文学革新申议》,《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生动地描述了少数英哲人物“独战多数”的必要性：英哲人物往往由于率先提出新的思想而被愚弱的群众当作“捣乱分子”杀死钉死烧死，过了若干年，新思想被证明为正确的，“于是社会的多数人又把他们从前杀死钉死烧死的那些‘捣乱分子’一个一个的重新推崇起来……却不知道从前那种‘新’思想，到了这时候，又早已成了‘陈腐的’迷信！当他们替从前那些特立独行的人修墓铸铜像的时候，社会里早已发生了几个新派少数人，又要受他们杀死钉死烧死的刑罚了！”这种恶性的循环与其说揭示了社会运作的必然悲剧性，不如说阐释了深刻的反抗“多数人”的必要性。联系到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反复强调的“任个人而排众数”的“独战多数”观，联系到从《狂人日记》始有表现的个人与“群众”对垒的结构模态，便不难发现，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确立与普遍反抗的新“法统”之形成其关系是如何的紧密。

当然不是说所有的现代文学作品都表现着反抗的意绪，现代文学的反抗“法统”并非无往而不在地便存于新文学的每一个角落。任何时代的文坛上都会有平和宁静之作湿润着人们干枯的心田，甚至即使在充满动荡的现代中国也能唤起人们久远而亲切的记忆，不过这样的作品至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来没有占据到主流位置，主流的文学总是饱含着反抗的情绪，并以此传承着新文学的“法统”。这样的“法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甚至坚固到无可颠覆的境地。革命文学倡导时期创造社、太阳社竞相实施对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全部的批判”，可他们的思维方式甚至表述语式都能看出与五四时代“重新估价一切”的反抗、怀疑精神的法统联系，因而 30 年代人们在否定五四的同时提出“再造一个五四运动”^①，正是承认和肯定了他们与五四“法

^① 胡秋原：《五四文学运动之历史的意义》，《文学》第 1 卷第 1 期。

统”的这种联系。

新文学界“普遍反抗”的最初也是最表象和最深刻的结果，便是白话文传统的形成和发展，这在形式论意义上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体格，也可以说是现代文学所成的“体统”。胡适说到五四新文学的体格与传统时，最先想到的便有“文字体裁的大解放”和“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并从新传统的意义上总结道：“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新文学的文体是自由的，是不拘格律的。”^①这可以说是揭示了中国现代文学最基本的传统，也是一向受人忽视的外在的、表象的传统，然而从中国现代文学近一个世纪的发展状况来说，这其实是新文学最深刻也最卓有成效的一脉传统，故而可用“体统”一语加以概括。

中国现代文学近百年发展的最重要的成就，便是成功地建构了在现代汉语规范化建设意义上的语言体统。只要注意比较五四时代与当下中国文学的基本情形，应不难明白，其间差异性最大同时进步最为明显的是现代语言表述的稔熟度。即使在最自负不凡的先锋文学那里，个性主义的表现除了更其生硬更其做作（比方说煞有介事地用“你不可改变我”之类的话作标题）而外，根本看不出较之五四文学有什么明显的进步，但这种时代距离感从文学语言方面看却是确凿无疑的。当胡适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白话文，提倡以白话为文学语言之正宗的时候，人们几乎都不会怎么顺滑地说白话及写作白话，包括新文化的倡导者和白话文的鼓吹者在内。新文学家一开始的白话表述都还生硬地带有文言文气息，或者为了适应于现代表述的严整性和规范性，刻意追求语体的完整方正，于是写起来执执拗拗，抖抖

^① 胡适：《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索索,这就构成了十分著名的“新文艺腔”。五四时代及其后相当一段时期内,这种“新文艺腔”成为文学表达的普遍语言样式。从左翼文学时期开始,新文学家反思白话文的“新文艺腔”,倡导“大众语”,后来不断升级的政治话语强权又逐步弱化了大众语因素,成为统制人们言语表述乃至左右人们文学思维的核心力量。到了90年代,文学语言才开始摆脱了大众语的善意的纠缠,摆脱了政治话语的独断性束缚,但它始终没有离开五四白话文的体统。现在,中国文学家可以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语言的自由表达成为过去一个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最富实质性的成就,都应归功于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白话文体统的确立和不断加强。

五四时代的白话文运动不同于前此历次白话文倡导,它本质上是一场“国语文学”的运动,是旨在建立正宗的语体系统、建立规范的白话文体的新传统运作。黄遵宪的诗文革新运动和“我手写吾口”的主张,并未直接强调文学语言的白话体格,而是强调将当时社会生活中已经出现的词汇语法(即当今“流俗语”)融入诗文表述之中,——现在读起来看起来虽然是“流俗”的,可五千年以后的人看来,不就“惊为古斑斓”了吗?可见他所注重的是在语汇意义上的革新,并非白话文体的建设。梁启超的“新文体运动”倡导古文的解放,同黄遵宪相通的地方是呼吁“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强调“纵笔所至不检束”,“务为平易畅达”。胡适对这种新文体赞赏有加,但并不认为这样被解放了的新文体就能解决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他认为必须在“国语的文学”这一确立新文学传统的意义上和改变整个国家和民族语言规范的高度上提倡白话文,而不是仅仅因白话文在某种“文体”上的可用性才加以提倡。他意识到白话文比文言文更“优美适用”,但没能深刻地指出文言文怎样不“优美适用”,倒是傅斯

年的分析中肯而透彻：“中国文最大的毛病，是面积惟求铺张，深度却非常浅薄。六朝人做文，只知铺排，不肯一层一层的剥进。唐宋散文家的制作，比较的好得一点，但是依然不能有很多的层次，依然横里伸张。以至于清朝的八股文，八家文，……都是‘其直如矢，其平如底’：只多单句，很少复句，层次极深，一本多枝的句调，尤其没有了，这确实（是）中国人思想简单的表现要运用精密深邃的思想，不得不先运用精密深邃的语言。”他从旧文言的抨击切入了白话文的呼唤：多单句而少复句，层次缺乏而平直乏味确乎是五四先贤们对古典文言的一般评价，虽然那实际上含有一种时代性的偏见；而那种“精密深邃”的语言只有在“理想上的白话文”、“‘逻辑’的白话文”、“哲学的白话文”和“美术的白话文”中才能产生。这就是傅斯年对于胡适的“文学的国语”观的呼应，也是对“层次极复，结构极密，能容纳最深最精思想的白话文”传统的呼唤。同样是站在建立现代文学语言规范、建构“文学的国语”和“国语的文学”的思想高度，傅斯年不仅对文言文做出了有力的抨击和声讨，而且对白话文也做了标准化（国语化）甚至完美化的要求：“现在我们使用白话做文，第一件感觉苦痛的事情，就是我们的国语，异常质直，异常干枯。……到了现在，我们使用的白话，仍然是浑身赤条条的，没有美术的培养。”^①处在白话文倡导的时期能够对白话文的表述功能提出如此不满足的意见，并十分明确地提出通过“美术的培养”优化白话文的设想，体现了新文学家可贵的理论自觉以及开创现代文学语言新传统的抱负。

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另一主脉是以现实主义为中心的文学

^① 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流派“系统”。文学流派(哪怕就是老实巴交的“创作方法”意义上的)系统通常是人们总结文学传统时最为关注的一个方面,例如在论述古典文学时人们总忘不了阐述“诗骚传统”,或如唐代殷璠《河岳英灵集集论》中所说的“风骚两挟”的传统,而谈及英国小说的传统时,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一书中关心最多的便是“经典现实主义”及其表现方式。^① 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一般也离不开现实主义等流派的追索,只是尚缺乏置于文学传统意义上加以考察的自觉意识。

将现实主义理解为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主脉流派,自然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在新文学传统确立时期现实主义就得到了充分的强调,而在现代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现实主义都在大部分作家和评论家那里得到了首肯和认同,甚至经常得到刻意的打扮,使之在与其他“主义”的比较中显得更加辉煌夺目。新文学倡导者一开始便是将现实主义当作新文学传统的根基加以确认的。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纵论近代以来文学大势,排列出由古典主义而浪漫主义而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进化线索,指出,“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沈雁冰稍后介绍“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主义”,正是认同了这种文学进化线索的描述,只不过从文章题目上看他更愿意将现实主义作为世界文学发展的新近结果被中国接受。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这一纲领性文献中大书特书的三大主义正包括写实主义,不过没有重弹文学进化论的老调,而是从文学价值功能上肯定了写实主义的“新鲜”和“立诚”,并想凭借能够“立其诚”的写实主义救助中国旧文学的“不诚

^① 凯·贝尔塞:《重解伟大的传统》,见《重解伟大的传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